

威廉斯小说观补论

殷企平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雷蒙·威廉斯的小说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观和艺术观。本文从这两方面入手,对威氏小说观的内涵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对他的可知群体论作了重点分析。

[关键词]有机体;经验流;可知群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6-0086-04

A Supplementary Study of Williams' Fictional Views

YIN Qi-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Raymond Williams' theory of the novel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his respective views on society and art. Proceeding from these two aspects, the present paper delves into the essence of Williams' fictional theory, while laying special stress on his views on the knowable community.

Key words: organism; the continuum of experience; the knowable community

雷蒙德·威廉斯是当代英国小说理论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家之一。若论学识的渊博和视野的开阔,大概只有克莫德能与他匹敌。笔者曾于《召唤新现实主义》一文中对其现实主义小说观作过介绍,^[1]但由于篇幅有限,文中未能对深藏于其小说观背后的社会观和艺术观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此外,他有关可知群体的论述也有待于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一、反对“两个分裂”

威廉斯的社会观和艺术观各有一个出发点,或者说各有一个基本前提:他的社会观以反对社会与个人的分裂为前提,而他的艺术观则以反对艺术与现实的分裂为前提。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威廉斯的社会观。在其名著《漫长的革命》中,他对霍布思、洛克、卢梭、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的社会观逐一作了剖析,进而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表现出一个“执拗的倾向”,即“把活生生的过程——笔者按:社会和个人都被看成一种生长的过程——描述成固定的、可以分割的客体”。^[2]当然,这些思想界的巨人在许多方面都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霍布思和弗洛伊德都认为个人在本质上是“自私”或“反社会”的。^[2]因此需要社会来加以制约或疏导。又如,由洛克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往往“把抽象的个人理想化”,而卢梭和黑格尔等人则“倾向于把社会理想化”。^[2]然而,在威氏看来,所有这些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流派多多少少地遵循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把社会和个人分裂开来。威氏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最终导致了当代小说中个人和社会分裂的现象。^[1]

[收稿日期]2000-04-12

[作者简介]殷企平(1955-),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事英国文学和小说理论研究。

针对上述情形，威廉斯提出了社会和个人无法完全分割的观点。他指出，人一生下来就(通过家庭的纽带)与社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个人和社会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换言之，社会寓于个人之中，“要充分了解两者中的一方，就得了解另一方”。^[2]威氏高度评价了弗洛姆的“社会性”一说，因为后者“描述了社会行为转变成个人的部分性格这一过程”。^[2]根据弗洛姆的观点，社会性意味着社会的需求被内化为个人的愿望和需求。威氏把弗洛姆的这一观点跟弗洛伊德的观点作了对比，认为前者比后者要高明得多。在弗洛伊德那里，社会只是起着压抑或排解个人欲望的作用，而弗洛姆强调的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过程”，弗洛伊德描述的社会与个人的联系是一种单一的关系，而弗洛姆的“塑造过程包括了多种多样的关系”。^[2]在弗洛姆理论的基础上，威氏进一步强调社会和个人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长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具体体现是人类“创造、交流并建立社会机构的实践”。^[2]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一书中，威氏对这种相互交错的关系有过更简明的论述：“社会……可以在个人中并通过个人得到观察和评价：社会不是作为界定个人的框架，也不是作为各种已知关系的总和，而是作为一种看似独立的有机体、一种人物、一种行动，就像个人一样。社会不只是起衡量作用的准则，不只是起控制作用的机构，不只是起界定或改造作用的标准。它是一种过程，一种进入个人生活、并加以塑造或毁坏的过程……”^[3]这段话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社会必然进入个人的生活，二是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跟个人一样，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有意思的是，威氏在《漫长的革命》中曾经提倡用新的术语来描述个人和社会，他分配给个人的术语是“有机体”，而把社会称为“组织”，不过，他同时又把个人也称作“组织”：“这个我们称为个人的特殊组织，通过对一个大得多的组织的表述而存在，前者在某些基本方面跟后者是一种延续关系。”^[2]这里，那个“大得多的组织”显然是指称社会。总之，社会和个人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延续关系。这一思想构成了威氏小说观的主要基石之一。

跟他的社会观一样，威廉斯的艺术观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这一次他反对的是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分裂。他首先指出，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还是现当代的唯美主义和抽象主义，都以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为基本前提，即“艺术与现实的分离，或人与他所观察的世界的分离”。^[2]对此，威氏指出，当务之急是“改造我们有关艺术的思维”，进而确立主客体不可分割的思想：“我们必须把人类经验视为既客观又主观的、不可分裂的整体过程”。^[2]威氏还吸收了生物学家扬格(J.Z. Young)和布雷恩(Russell Brain)等人有关人脑如何认识世界的研究成果，以此对机械唯物主义艺术观和唯心主义艺术观同时作出了批判：“有关意识的新发现使我们不可能再假设存在着这样一种现实，即在不让人类的观察和阐释进入其内的条件下被人类体验的现实。因此，幼稚现实主义的设想——在脱离我们的主观反映的情况下观察事物本身——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不过，有关意识的新发现同样不可能把我们导向以新面目出现的唯心主义，这些新发现并未要求我们认定在人脑之外不存在任何现实，它们只是要求我们坚持如下观点：所有人类经验都是对人身之外的现实的一种解释。”^[2]威氏的这段论述如今仍然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解构主义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引起的种种困惑面前，我们应该能从威氏那里找到有助于走出迷津的启示。

从主客体不可分割这一思想出发，威廉斯对艺术家的活动及其本质作了探讨。他认为艺术家的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工作”，^[2]也就是把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跟别人交流。威氏从三方面强调了这种传播工作的含义：(1)经验传播的前提是充分的描绘，而描绘过程本身意味着艺术家“重新创造自己”；^2经验的传播意味着“改变现存的关系”，^[2]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乃至整个环境的关系；(3)传播工作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接受者。威氏这里其实表达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艺术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整个传播过程“既不只是主体作用于客体，也不只是客体作用于主体，而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2]其二，艺术的标准要从作者和受众两个角度来把握。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较详细地引用威氏的一段原话：

“艺术上的成功意味着向旁人传递经验的形式能使经验得到积极的再创造——不是‘被观照’，不是‘被审视’，也不是得到被动的接受，而是由接受者通过对那种传递方式的反应而重新来一次彻底的、实实在在的体验。在这一关节，一些艺术作品露出了败迹，其根本原因是艺术家没有充分地组织起自己的经验，所以无法发现让别人分享自己经验的手段。^[2]

我们从以上论述中又一次找到了批判解构主义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有力武器。后者虽然指出了传统文艺理论一味强调作者这一缺陷，但是却走向了过度强调读者的另一个极端，最终步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相形之下，威氏既充分强调了艺术受众的创造性，又始终把这种创造性跟作者的导向作用（交流手段和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把艺术标准落到了实处。

威廉斯不仅尖锐地批评了艺术和现实分裂的倾向，而且还提出了扭转这一倾向的对策。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并确立新的术语——通俗地说，也就是要改造艺术领域的话语体系。例如，他认为“作为载体的艺术”和“自足自律的艺术”——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可以在威尔斯和詹姆斯当年的争论中找到——等术语就需要改造：“这些术语——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失败的记录。^[3]他针对性地提出了“经验流”这一术语，其特点是“把生活和艺术连接在一起”^[3]。按照他自己的解释，“经验流”意味着“一种积极的关系”，它“不是有待于被某种手法吸收的题材，而是一种几乎要打破——需要打破——任何现成的表意形式的一种体验；它通过自身……创造着形式，创造着生活”。^[3]值得强调的是，“经验流”中的“流”字是关键，它意味着艺术和生活互相对流、互相延续（同时不断打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这样一种过程。这一术语并非完美无缺，它本身还需要许多附加性的解释，否则难以让人明白。不过，这一术语提出的本身确实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去考虑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下文中要讨论的那部分威氏小说思想。

二、可知群体

“可知群体”是威廉斯小说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始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小说都是可知群体”。^[3]这句话的意思是：小说家大都用——而且应该用——适当的方法来确保小说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可以起到交流作用，即上文所说的传播作用。上文提到，威氏主张艺术的主体和客体互不分离，这一思想也反映在“可知群体”概念之中：“可知的不仅仅是客体的功能，即有什么可以认识。同时牵涉到的还有主体的功能，即观察者的功能——想要认识什么以及需要认识什么。换言之，可知群体不但是一个明显的与事实有关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意识问题。确实，小说发展的主要过程之一必然跟认识某个群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寻找某个位置的问题——寻找一个能令人信服地观察生活经验的位置，并以此作为认识有关群体的起点。^[3]

威廉斯是从认识社会和历史的高度来强调可知群体的。如前所述，他十分注重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需要借助许多中间环节来实现。除前面提到的家庭纽带之外，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也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同样，有关这些中间环节的记录应该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威氏说得非常清楚：“从狄更斯到劳伦斯，我们得到的是一段可以从中汲取勇气的历史。这一历史不是一连串的先例，而是一组有关人生的意义，一组把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意义。需要重视的是，这段历史并没有用其他方式得到记录。假如这些小说没有写成，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历史就必然会明显地苍白许多。当我们阅读了这些小说以后，就会对相应的思想史和一般社会史产生不同的认识。小说比任何有关人类经验的记载都更深刻、更早地捕捉到了一种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群体、人的本质以及可知的人际关系所引起的问题的认识。^[3]威氏此处特别强调的是“把人类连接在一起”，其前提是一组组可知群体，即可知的社会群体、人的本质和人际关系。上述引文还有另一层

意思：小说是使社会群体和人际关系成为可知的必要途径。这在下面这句话中更为明白：“某些情感，某些人际关系，某些人际关系的融合，以及某些人际关系的断裂，只能通过小说来加以认识。”^[3]确实，小说在记录社会群体——尤其是情感层面上的社会群体——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廉斯指出，在狄更斯之前，可知群体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用传统方法写就的小说一般能够刻画出可知人物、可知群体和可知现实。然而，到了狄更斯的年代，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如果还是用传统的小说形式来表现新的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及其相互间关系，那么最终展现的必然是不可知群体。威氏认为，狄更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新的小说形式展现了新的社会现实——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反映新兴城市文化的可知群体。威氏进一步指出，创造新的可知群体意味着寻找新的方法，而新方法本身则意味着对新现实的体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威氏提出了方法即经验这一观点，并以狄更斯为例，强调后者的“方法就是他的经验”。^[3]

威廉斯还从可知群体的角度回答了小说是否正在走向衰亡的问题。他承认小说已不再是像19世纪中叶前那样起主宰作用的艺术形式，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形成了对小说的挑战。然而，他坚决反对小说已经式微的说法，其主要理由是可知群体的问题如今仍然迫在眉睫：“我认为社会群体的问题——具体地说，小说中的可知群体问题——仍然既急迫又棘手，不管我们在其他方面作出了多大的努力，我们仍然要回过头来面对这一问题，仍然要通过创作来探索塑造可知群体的可能性。”^[3]回顾一下威氏主张艺术和生活不可分割的思想，就不难理解威氏的意思：小说家创造可知群体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了解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活动及其本质的过程。随着时代的更新，对人类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更新。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威氏认为小说的作用不但不应该削弱，而且应该加强。

在某种意义上，威廉斯的以上观点可以被看作对福特小说思想的呼应。后者曾经在《英国小说》一书中指出：“如果你要了解你周围人的全部生活，那么它（小说）是你可以求助的惟一法宝。”^[4]此话的关键在于“全部生活”一词。在工业文明之前，人们大都在同一地方生，又在同一地方死，因此对左邻右舍的全部经历有可能非常熟悉。然而，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们发现自己的左邻右舍（包括同事）不断地更迭变换，所以要直接观察周围人的全部生活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起到了很好的替代作用，因为至少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向我们提供全部生活的图景。跟福氏一样，威氏也强调小说在认识个人的全部生活方面的功能，但是他的观点显得更为全面——他把了解个人自我以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看作小说的特有功能：“……可知群体问题……牵涉到人际关系问题、如何了解我们自己并了解他人的问题，以及如何了解我们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3]简而言之，只要可知群体的问题还存在，小说就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威廉斯的以上观点确实从新的角度提供了小说生存的重要理由。尽管电影和电视等大众媒体从小说那里夺走了相当数量的受众，然而小说在塑造可知群体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媒体无法企及的。仅凭这方面的论述，威氏就足以在小说理论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 [1] 殷企平. 召唤新现实主义[J]. 外国文学, 1997(5): 64-67.
- [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2. 93, 77-78, 77, 98, 79, 79, 100.
- [3]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13, 138, 137-138, 138, 14, 17, 191, 190, 32, 186, 187.
- [4] Ford Madox Ford. The English Novel[M].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Limited, 1983. 8.